

序一：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王 瑶

1925 年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的时候，鲁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观北大》（见《华盖集》）。鲁迅认为北大有着优良的“校格”，而且以被人视自己为“北大派”而自豪。他认为北大的“校格”有两条：“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现在北大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九十周年校庆了，回顾九十年来的历史，总的看来，它的经历是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充满了如鲁迅所说的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要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变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是不能忽略北大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

近年来由于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于是探讨和比较中外文化思想的特点、异同，以及彼此间的交流和影响的文章日渐增多，甚至有人称之为“文化热”。其实就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而言，这个过程至少从戊戌维新运动就开始成为震撼社会的思潮了，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它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和思考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在进行理论的、思辨的探讨问题

的同时，认真考察一下清末以来的历史进程，无疑是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的。因为像如何汲取外来学术文化而使之现代化这类重大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前人也曾为此作过深邃的思考，在某些方面还有过艰辛的实践，无论其成败得失，他们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都是宝贵的。由于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有很多困难，甚至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综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因此我想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观点，来考察中国在学术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过程，可能是既具体有徵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我是从一个关心这方面问题的读者的需要提出这个希望的，并且认真想了一下，觉得如果把北大作为考察的角度或审观点，是相当典型的，容易说明全局性的问题和历史进程。我设想这本书的名字可以叫做《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本书，我自己也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我这个想法是受到两方面的启发的。第一，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访问苏联之后，曾写过一本书，叫做《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实际上是通过斯大林来介绍苏联的，当时曾轰动一时；现在看来，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这种通过某一审观点来总揽全局的写法是可取的，这本书就写得很漂亮。鲁迅也曾计划用“茶、酒、女、佛”四个字来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专章题目，同样是想通过典型的历史现象的角度来综述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全貌的；足见如果选择得当，这种方法是可取的。第二，冯友兰在他的《三松堂自序》中记述了曾任北大校长多年的蒋梦麟对他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蒋梦麟说：“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这里说明了他多年当

校长的体会。大学中也确实存在这么三派势力，因此冯友兰对之颇加赞许。但他言犹未尽，值得再深入分析。从逻辑上说，三派势力中两派的联合共有三种可能：其中校长联合学生反对教授一种，事实上没有可能，也从未在任何大学发生过；就北大学生方面而论，不仅五四运动以来就有“民主堡垒”之称，直到今天，“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北大学生首先提出的，“小平 您好”的标语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不能设想居领导地位的校长会联合学生来反对教授。至于校长联合教授反对学生的事，旧社会在一些反动势力很强的学校里的确发生过，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大的教授人数很多，集中了各种学科的专家学者，用表彰的口气说是“人才荟萃”，带点贬意的说法是“知识分子成堆”，或者如十年动乱时期的斥之为“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其实这些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在学术上都有一定成就的群体；他们勤恳地教书育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尽管由于年龄、经历和修养的不同，在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上可能与学生有较大的差别，但从来也不曾想到要同自己爱护的学生处于对立的地位。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全体师生联合起来反对校长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一些大学里也发生过，而且当然是为校长以及有权任命校长的执政当局所最不愿发生的。所以蒋梦麟的经验和体会实际上是从校长的地位考虑的，就是说作为校长，一定要用全力来防止第三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如果引起全校师生的一致反对，校长就必然会当不成的。其实这也是当权者在遴选校长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为选任大学校长毕竟同任用其他政府官员不同，任命者必须考虑到这个人选在教授和学生中所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他必须选择学术地位很高、能孚众望的知名人士来担任，以便除了希望能够体现当权者的意图之外，还能缓和与调整学校内部的关系。就校长本人说，虽然一个大学在整个社会中确实只是一个小的单位，所谓“庙小”、

“池浅”也不无道理，但它的影响却是弥漫于全社会的；因此作为校长，他也必然会珍视这种地位，以学校的名义和声望进行活动。举例说，最初主持京师大学堂校政的孙家鼐，他是咸丰时的状元，光绪帝的师傅，当时声望很高，至少在表面上是支持变法维新的，因此才有设置西学、开办译书局等措施，但他又不是维新派，与康、梁等人不同，他还是近代工业（纱厂）的开创者，因此考察他与维新思潮的衍变关系是符合中国现代思潮的历史进程的。又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实际上当时五四爱国运动是以学生为王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教授为主的，校长并没有公开出面倡导，但林琴南《致蔡鹤卿太史书》仍以校长为主要攻击对象，就因为他主张大学应“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且认为大学不仅为“按时授课”之所在，且“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见《答林琴南书》）。可见如果我们认为北大可以作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一个适宜的审视点的话，那么历届校长的声望、思想和学术贡献等是可以作为北大的社会影响的适当代表的。而且教授和学生都是群体，其构成比较参差复杂，而校长则为个人，在总体上是代表学校某一时期的社会影响的。因此我觉得从历届北大校长来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进程这一设想，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这一设想的着重点是考察中国现代思潮，而不是北大校史的变迁。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举例说，孙家鼐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严复对《天演论》、《法意》、《群学肄言》等的翻译及其政论著述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和教育思想，胡适的主张白话文以及倡导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面的尝试，都不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事情。一直到解放以后，我们现在不是仍然怀念和思索马寅初在 50 年代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和人口

计划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的吗！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但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

去年(1987年)纪念八一建军节六十周年的时候，上映了一部论述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纪录片，片名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我觉得这个片名起得很好！因为无论就哪一方面作历史的考察和研究，都是为了从中得到启示、有益于今天和明天的。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这样，北大也是这样。在今后的年代里，北大当然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发扬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的“校格”，才能无愧于时代所赋予的使命。现任北大校长提出要发展基础科学、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个提法本身就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它说明我们的视野已经和过去不同，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我相信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在促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研究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努力中，北大是一定会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的。

1988年1月5日

序二：自由的精魂与文化之关切

乐黛云

北大自由精神的奠基者蔡元培校长早就指出：“大学不是养成资格、贩卖知识的地方”，也不只是“按时授课的场所”；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学者更“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的人格”。他抱定学术自由的宗旨，在北大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正如梁漱溟先生所回忆：“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①梁先生特别强调这一大潮流的酿成，“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于蔡先生的“器局大”和“识见远”。所以能“器局大”、“识见远”，又是因为他能“游心乎超实用的所在”。

这个“游心乎超实用的所在”讲得特别好。大凡一个人，或拘执于某种具体学问，或汲汲乎事功，就很难超然物外，纵观全局，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知识分子素有“议而不治”的传统，一旦转为“不议而治”，那就成了实践家、政治家，而不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法国社会学家艾德加·莫林（Edgar Morin）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说明“知识分子”一词的内涵：1. 从事文化方面的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86页。

职业；2. 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3. 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① “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大约就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所讲的“精神生产”；“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作用”就是构筑和创造某种理想，并使它为别人所接受。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理想可以塑造现实，可以重铸历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实际影响。“自觉追求普遍原则”就是曼海姆所说的，知识分子应保留一点创造性的不满的火星，一点批判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② 也就是如连·本达（Julien Benda）所说的，知识分子理想的绝对性禁止他和政治家难以避免的向真理妥协，和塔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说的“把文化考虑置于社会考虑之上，而不是为社会利益牺牲文化”。^③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④ 它是知识分子长期精神生产的结果，而不是暂时的政治斗争的产物。

北大的校长们，很多都曾有过不和“政治家难以避免的向真理妥协”的经验，他们总是敢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直到今天，每当我们困扰于计划生育的两难境地，我们总是不能不想起马寅初校长和他的《新人口论》。1957年马校长将他多年来思索的结晶《新人口论》按正规手续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指出控制人口十分迫切，十分必要。他语重心长地警告说：“人口若不设法控制，党对人民的恩德将会变成失望与不满。”回答他的，

艾·德·加·莫林：《知识分子——虚构的批评和批评的虚构》载《论争》第4卷，第20期，第35页。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转引自詹姆士·威肯生著《欧洲知识分子的抵抗运动》，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塔柯·帕森斯：《知识分子——社会的一员》菲利浦·里夫编：《论知识分子》，纽约双日出版社，1970年版，第4页。

列宁：《做什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202页。

是百人围剿，他十分愤慨地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鲜明地表现了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坚持真理的悲壮之情。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如果马校长当时所面对的政治家多少能听取一点不囿于眼前实利而从长远出发的真知灼见，马寅初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贡献将无可估量。马寅初所以能高瞻远瞩，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正因为他不是个实行者，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位置是“议而不治”。这就保证他可以摆脱一些局部和暂时利益的牵制，不需要屈从于上级而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智慧造福于社会。

相反，北大也有一些校长，他们同时是朝廷重臣，如孙家鼐^①，他虽有开明的思想，也有重振国威，兴办教育的志向，但他毕竟是“官”，所以和康有为、梁启超不同，终于不能越政府的“雷池”。严复，这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被袁世凯拉入政府，脱离了“议而不治”的地位，就无可避免地屈从于实际政治，卷入复辟逆流。

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北大的大部分校长都是“把文化考虑置于社会考虑之上”，对于文化都怀着极深的关切。九十年来，再没有比中西古今之争这个百年大课题更引人注目，更得到全国关切的文 化问题了。如果说孙家鼐囿于他的地位，只是把中西文化关系局限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层次上，那么，严复提倡的却是“非西洋莫以师”。他的《天演论》之问世，如“一种当头棒喝”；“一种绝大刺激”以至“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①严复所考虑的是更深的文化关切。他超越了“师夷长技”的“言技”阶段，并指出当时盲目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作法有如“淮橘为枳”，不能真收实效。因为

① 胡适：《四十自述》。

“苟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故要“自强保种，救亡图存”，不能只是“言政”，还要从根本做起，即“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以教育为本，也就是从文化方面来解决问题。

胡适进一步把中西文化关系放进时间的框架来考察。他认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个文明形成的生活方式”。因此“东西文化的差别实质上是工具的差别”。人类是基于器具的进步而进步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钢铁时代以及机电时代都代表了文化进化的不同阶段。西方已进入机电时代而东方则犹处于落后的手工具时代。西方人利用机械，而东方人则利用人力。他尖锐地指出：“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界限是人力车和摩托车的界限。”工具越进步，其中包含的精神因素也越多。摩托车、电影机所包含的精神因素要远远大于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轮船是物质文明。”胡适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首先不是地域的差别而是时代的差别，也就是进步阶段的差别。因此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进行根本改造与重建，以便从中世纪进入现代化。

梁漱溟不仅从纵的历时性角度来考察中西文化，而且第一次从西方、印度、中国三种文化系统的比较中，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中来研究中国文化。他认为这三种文化既同时存在而又是递进发展的。西方文化取奋身向前、苦斗争取的态度，中国文化取调整自己的意欲，随遇而安的态度，印度则取“销解问题”，回头向后的态度。梁先生认为西方文化已经历了它的复兴，接下去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后是印度文化的复兴。三种文化各有特点，同时也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文化应在自己的基础上向西方已经到达的那个阶段发展，因此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应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西方文化则由于第二阶段发展不充分，出现了种种弊病，应回头向中国化学习、补课。

从世界格局来研究中国文化就有一个相互交流的问题。汤用彤先生特别强调了文化交流中的“双向性”。他认为两种文化的碰撞决不可能只发生单向的搬用或移植。外来文化输入本土，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在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冲突中生存繁衍，因此它必然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它又必然被本土文化吸收融合，成为本土文化的新成分。无论是外来文化还是本土文化都不可能保持原状而必融入新机，这就是文化的更新。汤先生以毕生精力研究了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处处证实了“印度佛教到中国来，经过很大的变化，成为中国佛教，乃得中国人广泛的接受”。他将这一过程归结为：因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因看见不同而冲突，因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是时间的先后次序，也是一般的逻辑进程。汤先生毕生从事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的研究都可视为这一结论的印证。直到如今，这一论断仍不失为有关中外文化沟通汇合的真知灼见。

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在不断吸收、变化和更新的过程中发展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文化传统都不是固定的，已成的（things become），而是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things becoming）。它不是已经完成的“已在之物”，只要拨开尘土就能重放光华，更不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百宝箱，只消挑挑拣拣，就能为我所用。传统就是与外界不断交换信息，不断进行新的诠释中形成的，传统就是这个过程本身。如果并无深具才、识、力、胆的后代，没有新的有力的诠释，文化传统也就从此中断。

季羨林先生最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发挥。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我认为这就是上述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积淀下来并不断发展的某些因素——笔者），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一切民族文化都需随时代发展而更新。季先生认为这二者相反相成，不

可偏废。现代化或时代化的标准应是当时世界上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任何文化的现代化都必须向这一最高水平看齐。因此，现代化与开放和交流密不可分。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论证，外来文化必有改变，传统文化也必得更新。二者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否则就只能停滞和衰退。季先生认为我国汉唐文化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是一方面发展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大力吸收了外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并输出我国的传统文明。反之，清朝末年的保守派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抱残守缺，一方面又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畏惧时代化和现代化，结果是国力衰竭，人民萎缩。未来的希望就在于赶上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并在这一过程中对过去的文化进行新的诠释。

回顾过去历届北大校长对文化问题的看法，对我们今天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仍是极好的借鉴。

北大的自由精神容纳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也容纳了人们几十年对文化问题的自由讨论，同时也容纳了个人人生信念爱好的不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就容纳了许多完全不同的人物。正如马寅初校长所回忆：“当时在北大，以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宠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目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季刚、刘师培、林损诸氏。”这些人都是可以保留自己独特的思想和信念，不必强求统一。正是这种不统一，才使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虎虎有生气。“不同”、“不统一”，保存自身的特点，维持相互的差异对于事物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就是全球意识背景上的文化多元发展。这是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帝国主义垄断结束的必然结果，也是 20 世纪后半叶无可抗拒的时代特征。特别是与进化论相对的耗散理论，熵的概念的提出，更是在今天的西方

世界形成了一种对模式化、一元化、“无差别境界”的深刻恐惧。熵的理论认为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能量水准的差异总是趋向于零。例如不同平面的河水，可以利用落差驱动水轮，可以发电，这是有效的、自由的能量；一旦落差消除，水面平衡，能量就转为无效和封闭。这就是说，无差别的，封闭性的一种模式、一个体系、一个权威，总之，一元化只能导致静止、停滞和衰竭。能量不断耗散而趋于混沌一致的过程也就是作为衡量这一混沌程度的单位的熵日益增大的过程。只有形成开放系统不断和外界进行信息交换，力求追取独特、差别和创新才有可能维持生命活力而不至于成为庄子所描写的那个无“七窍”，不能“视听食息”的名叫混沌的怪物。如果事物越来越统一，熵越来越大，人类就会在一片无争吵、无矛盾的静止、混沌之中沉入衰竭死寂。因此，人们把刻意求新，不断降低“熟悉度”，追求“陌生化”的作家称作“反熵英雄”。四人帮统治下的北大追求所谓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等五个统一，和蔡元培所开创的自由精神背道而驰，结果是扼杀了创造性，戕灭了生机。一切归于一致，也就归于静止衰竭。90年来，北京大学的校长们，从已故的蔡元培、马寅初、翦伯赞到仍健在的季羨林都曾为维护这种独特性、创造性，不苟同、不随俗而付出过昂贵的代价直到生命。他们是自由的精魂，他们的功业将没世永垂。

目前，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我们眼前展开。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正确方针为我们古老的民族注入了无穷的生命力；开放搞活的政策为彻底摧毁昔日“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9①}的封闭体系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正是在这样全民共振奋的形势下，北大当任校长率先提出了把北大建设成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壮志宏图，果真如此，则今日北大人将无愧于往昔自由精神

之前驱。

值此北大校庆九十周年之际，谨以中国文化书院之名义，将这本小书奉献于已故的，在世的，方生和未生的北大之魂。

1988 年 3 月 14 日

教育革新乃强国之本

—— 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大学士孙家鼐

罗 筠 筠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 终于打开了中国一向紧闭的门扉。国力的衰退、文明的沦丧，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为救国保种而不得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及社会上大部分知识分子，于西学只限于天文地理、数理化和器物制造这些所谓的“用”上，只有少数人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在介绍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强调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要冲决传统文化的禁锢罗网，解放思想 提倡变法维新。梁启超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材，人材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①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正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

物，也是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长期斗争的产物。

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的，是刑部左侍郎李瑞藻。1896 年 6 月，在他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认为只要通过大学造就一批人材，便可修内政，雪旧耻。1898 年 7 月 4 日，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京师大学堂，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相当于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一、一生为官，清正严明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州（今寿县）人，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咸丰九年（1859）32 岁时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此后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任官，以 82 岁高龄终于仕途，谥号文正。

孙家鼐初被点状元时，授职为修撰。第二年，充为武英殿纂修官，不久又被任命为总纂修。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由于校刊宣宗道光皇帝之圣训有功，奉旨升为候补的二十名等待升缺的前列候之位。同年七月，山西举行乡试，任正考官。同治元年（1862）三月会试任考官，八月入为实录馆纂修官。同治二年（1863），点为翰林，为翰林院汉办事官兼庶常馆提调。次年二月补为詹事府右赞善。同年四月，受任提督湖北学政。同治四年（1865）五月，迁为翰林院侍讲。六年转补侍读。同治七年（1868）湖北当差期满回京，于九月里被诏命在上书房行走，十一月被提为侍讲学士。次月，当上了日讲起居注官。同治九年（1870）转升为侍读学士，并任武英殿提调。同治十年（1871）五月，孙家鼐因病奏请解任归家养病，帝允之。接着，由于其母亲

去世，在家守孝。直至光绪二年（1876）才复出入都，仍命在上书房行走，充武英殿提调。光绪四年（1878）二月，与尚书翁同龢同被任命为光绪老师。次年晋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及工部左侍郎。随即，又被任命为文渊阁直阁事。光绪八年（1882）又兼署吏部左侍郎。同年四月会试中，为考试试差阅卷大臣。八月顺天府乡试充为副考官。至光绪十一年（1885）又充任会试考试试差阅卷大臣兼礼部右侍郎及顺天府乡复试阅卷大臣。此时，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把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宗咸丰皇帝，当时许多人认为不可，但孙家鼐与潘祖荫、翁同龢等人则认为可以施行，又再次请旨，最终朝廷从了孙家鼐等人之议。光绪十五年（1889），代理工部尚书。次年三月又兼理刑部尚书，并于十一月被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六月又兼礼部尚书及工部尚书，并很快补为顺天府府尹。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时朝内多数人主张战，而孙家鼐独认为不可开战。甲午战争后，面对中国再次被瓜分的亡国危机，全国兴起了一个救亡图存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为代表发起了一个以“救亡图存”为口号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他们设学会，办报馆，著书译文，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科学知识，并上书光绪疾呼变法维新。孙家鼐此时已年近七旬，由于他原为光绪之师，思想接近帝党，中日战争后，他开始阅读时务书，思想倾向变法。但与激进的维新派思想上也有分歧，并同顽固守旧派亦有联系。光绪廿一年（1895）八月，北京组织强学会，经常开会讲演，讨论学术，批评时政，鼓吹学习西方，变法维新，孙家鼐也曾列名强学会。但西太后等人认为这是“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逼迫光绪下令封闭强学会，虽然在胡浮辰、翁同龢等人的奏请下解禁，但清廷却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当时任吏部尚书的孙家鼐任